

中医后继乏人的感叹由来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,然而,如果我们今天能客观、清醒地面对一下统计数字的话,这完全是应该改观的了。

国家扶持中医,每年大量人力、资金投入,全国各省、直辖市都有自己的中医高等院校,每年数量可观的本科生、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,况且近年来在扩招,据说某省中医学院的在校学生数已达到五位数了,可谓浩浩荡荡,历古未见,人多热气高自然是大好事,而我却又因之而忧从中来。

第一,五位数学生的教学质量是否跟得上?我想硬件、软件都该有问题,据说唯一的办法即把班级学生数目大量扩充,由小班上课改为大班上课,俾教师与教室都能做到最大限度的物尽其用,用功的学生,想再选课程、研究学术,由于学分已满,伤心地给学校吃了闭门羹。最近在上海召开的全球大学校长论坛会上,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说:大学招生规模如果扩大一倍,教学质量要达到扩招前的水平,大约需要花费二十年的时间。洋人的话未必切合中医教学的实际,但这种严肃缜密的论述,对我们是不乏警示的。

其次,几年以后,大批因扩招而达不到要求的毕业生,一拥而上,面临就业,抢起饭碗来的可怕

从中医后继乏人说起

潘华信

情景,是可想而知,应该预料到的。于是被迫改行,当西医、做化验的有之,转业经商下海的更有之,现今这种现象已是十分普遍,更遑论几年以后扩招大军的面世了。其恶果是:国家浪费了资金,莘莘学子蹉跎了青春年华,老百姓失去了医、德双馨的上乘中医的精心诊治。

老子说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”对于“烹小鲜”,窃以为是指精心调料、细心火候来烧煮各种不同的海鲜鱼虾,中医传承乃大业千秋事,也应“若烹小鲜”,而决不是烧大锅菜,炒烂糊肉丝。于我个人经历而言,既“炒”过,也“烹”过,其中利弊,可谓一目了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为了继承、发扬,各种中医学习班应运而生,我常上台讲课,有时大礼堂容纳达数百学员,乌黑人人头一片,且领导授意,要一边讲,一边批,二小时下来,汗流浃背,不知所云,类此情景,持续数年,当年的学生队伍虽然可观,而今大抵落寞了,我连名字也记不上几个。八十年代初起,我到中医院为研究生班讲授“各家学说”,学员少则十余人,多则三十人,上课

贯彻了两大原则:一、不照本宣读,大家都识字,何必浪费时间,我常取逆向思维,引导学生深究原著;二、不以老师观点为是非评定标准,鼓励

学生独立思考,通过自己的论证来确立观点。如今这些为数不多的学生,不是主任、教授、博导的,反成了“凤毛麟角”。去春我应邀到台湾讲课,除桃园长庚医院、大林慈济医院里听讲人数较多外,一般也只是二三十人的范围,让我感动的是,不少青年中医往往从外县市赶来,不惮数十公里的颠簸之苦,反复听课,其中有当年全省“特考”的状元、第二名、第四名,在他们沉静、坚定、渴求新知的目光中,我获得了传统中医不绝如缕的信息和希望。由此得出结论,质量比数量更重要,后继乏人的提法不如后继乏人才来得更精确,一字之差,结果相背。历史上一个张仲景,一个孙思邈,一个叶天士,可以以一代百,以一代千,人数再少,倘是精兵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,千万个庸才混在一起搞浆糊,振兴无能,搞鬼有术,反误了事业的辉煌前程。

最近温总理强调:要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、人民、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,要向天看,不仅看自己的脚下。金玉良言啊!有感于斯,乃抒结想。

灵兰剔藓

朱大建

送别金性尧先生

安迪



金性尧先生肖像

金性尧先生走了。九十一岁应该是高寿了,但这些年来,老人身体精神都不好,整日枯坐,连报纸都没有精神翻看,他曾引过陈老莲的一句诗:“一日无书百岁殇”,对一个一辈子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来说,这是何等痛苦的事!

金先生出身在宁波定海的大富之家,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。可以说,他一生都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。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,早年以文载道的笔名写“鲁迅风”的杂文,后转入风土散文和文史随笔,他的《风土小记》曾得到知堂老人的赞赏。美国学者耿华德在《被冷落的缪斯——中国沦陷区文学史》中专门有一节论述金先生的散文创作,认为“他的散文牢固扎根于传统之中”,其实这也是金先生所向往的散文境界,他曾在一篇谈散文的短文中说:“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点缘,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醉然之味,而不流于空疏。”

七十年代以后,金先生出版了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《宋诗三百首》和《明诗三百首》,都有很大的影响。《明诗三百首》选注完成后,他对我说,这是他的关门之作。我当时劝他说,不要把话说绝,留点余地。不久我正好为一家出版社编一套散文集,就约他编了一本《伸脚录》。他在后记中提到了我和他的这段对话,说:“人到晚年,对于人间友谊的积累,缘分的护惜,有甚于金钱。”之后,又陆续出版了《不殇录》《闭关录》等多种文史随笔集。

虽然我是因为约稿才认识金先生的,但金先生把我视为他的“暮年知己,不仅仅为文稿事”。不管我编报纸还是杂志,金先生都是积极的撰稿人,他还劝我多写文章,就在他一边感叹“生趣索然”,一边还给我写信说:“要使自己学问上充实,写作也是一法,因为逼着你翻书,我就有此经验。写作上如遇难题,我可为你查核。”接下去的这段话尤让我感动:“近日目力衰退,几成朽木,旦夕之人,忝在交末,敢倾肺腑。”

今天我要去龙华送金先生,匆忙间写此短文以志哀思。

徐家汇藏书楼珍藏着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的中国传统经典著作,这些如今存世不多的译作,每一部翻译印都是早期中学西渐的重要一步。

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殷铎泽翻译的《论语》。1662年殷铎泽、郭纳爵将部分《论语》和《大学》翻译成拉丁文,在江西建昌刊行并带往欧洲。在此之前虽然已有1593年天主教教士东渡之祖利玛窦将“四书”译成拉丁文,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把

5月的傍晚散步路过底楼她家,透过庭院里参差不齐的花草,看见铁栅栏把着落地门。她不在这里住很久了。原本齐整的小庭院自然就肆意了起来,杂草在月季花丛间乱舞,院角的茄子番茄叶子纠成一堆,丝瓜藤爬满了铸铁围墙,那一棵慢慢生长的盘槐就只好陷落在了草叶的肆无忌惮中,倒还是枇杷树,突破重围,从容淡定地又果实累累了。

却是无人来享用。退休前她是古筝演奏员,退休后,很自然地成为了古筝老师,在艺校和家里教人弹古筝。倘若下午经过,一定就听见了筝音清冷。流畅起伏韵致的是她的,零散单薄的是学生的。几年里,从院外耳闻进而入室聆听,甚至有段日子里也跟着她摆弄起了筝弦,从《花非花》《采茶歌》到《渔舟唱晚》,颇得她的鼓励。兴致勃勃的当儿书房内古筝古琴共处一室,她还上门面授机宜。其实,私心里明了如此不过是一种亲近音韵的方式罢了,终于还是将古筝转给了他人,只留了古琴。见此,她略略地有些遗憾。我说,还是听你弹吧。

曾经有位老医生,一曲听罢,沉吟片刻,对她说:这才叫余韵袅袅啊。

她的女儿早已在花季病逝,丈夫因她一心扑在事业上而出轨,与之离异。她是与古筝陪伴了。所以,有孩子来学筝,不单是开源生活,也是快乐。

于是,在望花甲的时候,与喜欢艺术的退休医生慢慢走近了。庭院里的枇杷虽然金黄玲珑地挂枝了,不像往年有人收拾。在近乎锈色时她来了,兜了回去与老先生分享。庭院虽芜杂了些,却是为主人高兴的,筝曲有人赏,心音有人听,欢忧有人担,才是枇杷收获一样的茂盛吧。

季节按例而行,其他人家种的枇杷苗竟也长成亭亭貌,茎脉分明的厚叶子很老练地展开,一年的光景就二话不说地结了果,那个喜欢在自家底楼内外植

满花草树木的中年男人,他的枇杷树更是高大丰满生殖力旺盛。初夏的天气本来就是几天溽热几天微凉的,枇杷清甜而淡鲜的味道,较暑热里的冰镇西瓜少些透彻,比同时的青瓜多了点清新,恰也是匹配时序。

偶尔,淡淡地想到了她,应该都还好吧。在她的筝调里,老先生油画棒涂彩;不教课的日子里,去距离不远的美术馆博物馆看展览;桑榆不晚,其乐融融。庭院里被流浪猫翻落的花盆,乱成一团的草木,庭院外那株手植的橘树,已经与荒蔓缠在了一起,也就随它去吧,人的命运,草木的命运,都自有安排。

又一季的枇杷熟透了。却才知道她和老先生分手了。前妻的频频骚扰,女儿的干预,老先生犹豫不决的性格,竟是左右都想要的黏糊风流,她的精力,她的财力,她的痴心,再放在这里,实在是无谓和伤痛了。“我们去散步从来都不是两个人,他总要叫上多年在他家的保姆”,想象中的其乐融融是糅了许多杂质的。与她年龄相仿的保姆,看到她,眼梢里似乎瞥一位外来入侵者。老年人的情感世界,哪里和年轻人不一样,一样的恩怨交缠,一样的左右摇摆,一样的鱼和熊掌皆欲得,只不过力度程度减弱了,也是应该,毕竟荷尔蒙的生物性支撑乏力了。那就断了吧,虽然留恋着琴声不寂寞的日子,毕竟是要一份温暖纯粹的关怀和情感。为了方便教筝,她在市区租了房。日子又回到一个人。好在有那些学古筝的学生,他们的进步,是她的欢乐。

这里的房子偶尔也来看看,闻闻这里草木充盈的空气,屋子里还收着特地买来的番茄种子。年轻时她学的是琵琶,后来工作需要,转学了古筝,于是半生古筝,乃至古筝一生了吧。“来吃我家的枇杷吧”,总是记得她几年前说过的话。

坐落在这个半岛上。

我在伊斯坦布尔逗留5天,我住的宾馆,窗口正好对着这个马尔马拉海岸边的“历史半岛”,每天早晨站在窗前,遥望着一艘艘白色的渡轮,犁开碧蓝的海水,真是心情舒畅。

托普卡泊皇宫,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管理中心,现在被称为“旧宫”。皇宫是在拜占庭帝国宫殿基础上建造的,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都先后扩建了皇宫。托普卡泊皇宫现在是博物馆,陈列着奥斯曼帝国600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宝贝。和北京故宫一样,在这座宏大的皇宫中,看珠宝馆的游人最多。

当年皇宫的御膳房,曾拥有1200名厨师,每天要做5000人的饭菜。如今,御膳房的主要部分已辟为中国瓷器展览厅,收藏着1.2万件中国瓷器,我在这里看了又看,留连忘返。因为,我在国内没有看到过如此巨大的青花瓷器,一只只花样精美的巨大的缸、盆、碗,令人惊叹,一定是当年皇宫中的器物。

多玛巴切皇宫,现在被称为“新皇宫”,建于1843年,共用了13年时间才建成,花费了10亿马克。据说,这10亿马克原是军费,被奥斯曼帝国第31任苏丹用来造皇宫,为此次欠下大量外债。这个新皇宫有6位苏丹居住在此。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,首位总统凯末尔曾在这里办公一直到去世。之后,多玛巴切皇宫改为博物馆,这个皇宫共有258个房间,68个卫生间,巨大的客厅,巨大的吊灯,高耸的屋顶,显示出奥斯曼帝国往昔的威严。

圣索非亚大教堂,是拜占庭时期建筑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一件杰作。建于公元537年,圣索非亚大教堂作为基督教教堂使用了916年,作为清真寺使用了418年。这座长方形的教堂,圆顶非常高大,教堂是两位来自亚洲的设计师设计的,用16年时间才全部竣工。

奥斯曼帝国法提苏丹征服君士坦丁堡后,将圣索非亚大教堂内的精美马赛克壁画用灰泥覆盖掉,后改为清真寺,壁画却因此得到了完好



的保存。1935年2月,经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凯末尔批准,圣索非亚大教堂作为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,这些被灰泥覆盖掉的珍贵壁画又重见光明。走进这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,回顾它从基督教、清真寺、博物馆的命运变迁,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个简朴的真理:不同的文明之间,确实需要互相尊重,确实需要保持宽宏大量的胸襟,确实需要平等对话,和而不同,存异求同。

我们居住的宾馆,窗口对着“历史半岛”,大门对着伊斯坦布尔最热闹的步行街。每天晚上,步行街上人潮汹涌,仿佛每天都在庆祝节日。街头人流滚滚,路两边的商店里人却不多,而步行街两边的小巷子里,一家家饭店酒吧在路边摆开了桌椅,倒是生意兴隆,人头济济。在步行街附近的一间酒吧,正在演出土耳其民族歌舞,我们也每人掏30欧元买票进去观赏。小小的舞台四周,坐着几十位游客,每张桌子上插着一面土耳其国旗,一面游客所在国家的国旗。表演者其实都是社会上自行赶场子的艺人,有单干的,也有合伙的。节目最后,出来一个斯文的老头,讲英语,用男中音唱游客所在国家的民歌,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挪威、意大利、阿塞拜疆,一支支曲子唱下来。对着我们,老者唱了一首《康定情歌》。每曲唱罢,就会激起一阵热烈掌声。我数了一下,这个酒吧中的几十位客人中,大约来自十多个国家。由此可见,伊斯坦布尔称得上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了。



野雀枇杷(国画) 单子坚

中国传统经典西译著作

高洪兴

《五经》译为拉丁文,但利氏、金氏的译作早已无存,是否曾有刊印也有争议,而且论当时的影响,也不能同殷铎泽与郭纳爵的译作相比。建昌刊本《论语》与《大学》,西方版本学家一度以为已经散失,也有人认为,国外只有大英博物馆藏有全册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《论语》部分。从所藏来看,当时殷铎泽翻译的是《论语》前五章部分,每节上为中文原文,下为拉丁文译文,每个中文字右侧有注音。是书采用木刻单面刊印于宣纸上,中缝印有页码,具有中国传统线装书的特点,

十七八世纪在西传的中国儒家经典著述中,流传最广的当属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一书,由柏应理、殷铎泽、恩理格、鲁日满4人合著而成,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版。书中还第一次刊印了一幅孔子像,并即风行欧洲,法国、德国、荷兰的杂志纷纷介绍,1688年出法文译本,1691年出英文译本。促使更多的传教士投入到中国经典

著作的翻译中。藏书楼珍藏有1687年拉丁文版,为牛皮装。藏书楼珍藏的早期中国传统经典西译著作中,还有一部也深受瞩目,那就是比利时传教士方济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拉丁文本羊皮装《中国典籍六种》,是儒家经典《四书》第一次西文全译,也是《孟子》第一次被译成西文。

明请读十日谈 一篇《〈红楼梦〉英译本》 徐家汇藏书楼拾萃